

Geschenk
Prof. Dr. Michael Schoenhals



MS-125

学习动态 64

ERC Projekt
Mao Legacy
Uni Freiburg
Inv.

内部刊物 注意保存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学习动态》编辑组

1979年7月12日

第二期干部读书班已经结业。现选择学员在解放思想，增强党性方面的思想小结三篇，刊登如下：

在批判所谓右倾翻案风中的两点教训

第三海洋地质调查大队党委委员
政治处副主任 刘克强

我是一九七五年四月从部队转业到海洋地质调查局工作的。七
五年十一月我参加了局工作组，帮助局综合研究队搞整顿工作。整
顿结束时，我留下担任了支部书记、革委会主任。当时正是反击所
谓右倾翻案风开始的时候。从我担任支部书记起到粉碎“四人帮”
止，只有十个月时间。但这段时间对我来说教训是深刻的。粉碎
“四人帮”后，我曾总结过教训。这次来党校学习了七个月，比较
系统的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照这些原理，从坚持马克
思主义思想路线和无产阶级党性的高度，再来清理一下思想，总结
这段时间的教训，对于在新长征的道路上更好地沿着党的正确路线
前进，为实现四化多做点工作是很有必要的。

在一九六七年的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我们支部在我局所属

的几个单位来说，是跟得比较紧，跑得比较快的。局党委负责人也亲自来抓过，局里还转发了我们一份关于如何发动群众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简报。我们支部所以跟得比较紧，这与我在运动中的表现是有很大关系的。在运动开始的时候，我思想上和许多同志一样是想不通的。认为一九七五年形势刚刚好起来，钢铁开始上去了，铁路也通了，教育开始整顿了，派仗也不打了。全国开始出现安定团结、努力向上的局面。我怎么也看不出有什么右倾翻案风。但是这时陆续听到中央第一次打招呼会议的精神，《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上海的两家报纸每天有大量的“反击”文章。特别是七六年二月六日《人民日报》以记者的名义发表了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的文章，提出所谓追风源，我感到问题已经提得很高很尖锐了，再不行动起来就要犯右倾路线错误了。所以，支部立即办了骨干学习班进行动员。在这之后，我就按局里的部署跟。天安门事件之后，我就主动的跟。带头写了批党内资产阶级的大字报，还作了几次批判发言。七月底，我从外地调查回来，一到上海，就看到《人民日报》社论，要批所谓三株大毒草。我没有休息就抓批“三株大毒草”了。我为什么会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从思想不通到被动的跟，又从被动的跟到主动的跟呢？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现在总结起来，有两条基本的教训：

一是思想迷信、僵化，盲从。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不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来对待这次运动。

思想迷信、僵化、盲从，首先表现在没有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毛主席，对待毛泽东思想。长期以来，林彪、“四人帮”出于反革命的需要，利用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对毛主席的朴素阶级感情，

制造现代迷信，鼓吹“顶峰论”，“天才论”，“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等等。把活生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变成了僵死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教条，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象我这样只学过一点马克思主义而根底很浅的人思想上也弄得糊里糊涂，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践第一等等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上被吹光了。再加上“四人帮”动不动用“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文化大革命”等等政治帽子压人，把人们的手脚牢牢捆住。因此，我的思想就更僵化了。在这许多年里，“两个凡是”成了我分清是非的标准和处理问题的准则。说话行动离不开毛主席语录“最高指示”，语录上没有的，我就不说不做。而且认为这就是坚持马列主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由于林彪、“四人帮”散布的这一套框住了我的头脑，因此，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过程中，我就不可能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和方法去观察和分析问题，也根本不可能识破“四人帮”在这场斗争中玩弄的种种阴谋诡计。历史的教训告诉我，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违背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在实际斗争中就必然要犯错误。

思想迷信、僵化、盲从，还使我缺乏辨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对“四人帮”这伙隐藏在党内的野心家、阴谋家失去警惕。我盲目地认为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人都是高举毛主席旗帜的人，特别是“四人帮”一伙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我就更加以为他们是忠于毛主席的。因此，在政治上我从来没有对他们产生过怀疑，相反，是很信任的。对他们的所说所为，我总认为是

代表了毛主席的思想，反映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这次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过程中，我把张春桥、姚文元写的文章，看成是解释毛主席思想的；把被“四人帮”控制的《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看成是传达毛主席、党中央声音的；把“四人帮”控制的清华、北大，看成是毛主席、党中央抓的点，认为按这一套去办不会错。但是历史却证明，“四人帮”是埋在毛主席身边的一伙反革命，他们的讲话、文章以及他们控制的报刊所发表的文章，根本不是传达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而是为他们反革命的目的制造舆论。在这种情况下，盲目听从，只能是上当受骗。通过在党校学习，使我认识到，要使自己具有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只有靠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坚持唯物辩证法，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

思想僵化、盲从，还表现在群众观点的薄弱。尤其在重大路线斗争上，总认为群众怎么会了解上头特别是中央的路线斗争呢？“要使群众知，还得听通知”。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可以认识的，路线斗争也和任何事物一样有它内部的规律可寻，上层的路线斗争必然会通过一定的形式在群众实践中反映出来，而群众是实践的主体。因此，尽管路线斗争复杂，但总还是可以被群众所认识的。就拿七六年的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来说，有那么多群众干部反感，而且通过各种形式进行了抵制和斗争，特别是天安门广场的革命群众运动，集中反映了广大群众反对“四人帮”的革命情绪，集中反映了群众对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愤怒，这个事实雄辩的证明，广大群众对于路线斗争是能够正确认识的。我虽然也看到了群众的不满情绪，我自己也感到，我所看到听到接触到的情况，并不象报纸上讲的那样，到处在刮翻案

风。但是我却不相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也不相信群众的情绪是正确的，反而认为群众也和我一样，不了解上面的情况，不了解全国的情况，不了解真实的情况，因此，这是不可靠的，我还是听上面的保险。这个教训是非常深刻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今后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时候，都要坚信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真正的英雄。广大群众的情绪，广大群众的实践，才是检验一切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刻也不要脱离群众，要了解群众的情绪，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在日常工作中要这样，在路线斗争中也要这样。

我的第二个教训，就是有怕犯错误的消极的守节思想。自认为从四七年参军入伍以来，在部队二十八年没有犯过大错误，现在转到地方来工作，情况复杂多了，千万不要在今后十多年里出什么问题，平平安安干到退休。这种怕犯错误的消极革命思想，近几年有了发展。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自己对犯路线错误很害怕。按照林彪、“四人帮”的说法，在社会主义时期，只有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而且路线错了一切皆错。因此，犯了路线错误那就很难翻身。特别是我这样出身不好的人更犯不得路线错误。出身好的同志犯了错误，可以说是认识问题，觉悟水平低，至多是忘了本；而出身不好的同志犯了错误，那就是感情问题、立场问题，是坚持反动阶级的本性问题，那就永世不得翻身了。所以我在路线问题上更加小心谨慎。我从较长时间的观察中，得出了三条消极的防止犯错误的想法：第一，不要当把手。特别不要当一、二把手。当把手担子重风险大，在重大路线斗争中表态晚了，行动慢了，上级要打你的屁股；表态早了，行动快了，容易犯错误。如果做一般工作，就可以不表态、少表态、晚表态，一看、二慢、三通过。第二，不要多得罪人。既不要得罪领导，也不要得罪群众。

得罪了领导，工作不好做；得罪了群众，搞起运动来日子也不好过。所以，遇事往往摆摆平就算了。第三，办事照领导的意图依样画葫芦，照搬照抄。这一方面出于对上级的迷信，另一方面，如果万一出了问题，反正我也是执行者，不是我别出心裁、另搞一套。

我在七六年的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之所以从思想不通过到消极的跟，再到积极的跟，从思想根源上来说，还有这个怕犯错误的消极守节思想在作祟。我起先很小心，但当报纸上提法越来越尖锐的情况下感到不跟不行了，加上局党委来抓，单位里又有一部分人促，特别听到有人说我“右”的时候，就更感到压力大，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按照局里的意见，按照报纸的口径，自己带头批，发动群众批。这种怕犯错误的消极守节的思想，实质是要守住自己的名和利，是个人主义，是党性不纯的表现。通过学习，我认识到，共产党人干革命要有一个科学态度，实事求是就是科学态度。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当老实人，这是每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是对党对人民负责的表现。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不管有多大压力，都要襟怀坦白、光明磊落，敢于坚持真理，勇于纠正错误。对于原则问题，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无论面对着谁，都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要不怕撕破脸皮，不怕挨斗，还要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开除党籍，不怕撤职，不怕离婚。而我在这次斗争中，首先想的不是怎样做对革命有利，而是在自己个人利益上打圈子；不是为革命坚持七不怕，而是怕这怕那；不是实事求是，而是在舆论的压力下盲目地随着上级的指挥棒转。历史事实证明，不按党性原则办事，而消极防止犯错误，不但不能保证自己不犯错误，相反会促成错误。通过这次教训，才使我真正懂得了毛主席说的老实人终归是

不吃亏的，许多人吃亏就在于不老实的道理。如果在七六年的运动中，我能按党性原则办，在压力面前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跟着干，就不会犯错误。

从上述两点教训中，深深的使我认识到，一个革命者，要真正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一定要不断增强党性锻炼。一方面要不断端正思想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敢于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理，观察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群众路线和调查研究。另一方面，要扫除思想上的非无产阶级的垃圾，改造世界观。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立党为公、大公无私。只有无私才能无畏，才能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党性原则，不怕来自任何方面的压力，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也只有这样，才能在新的长征途中，为党多做一点有益的工作。

解放思想 提高执行党的路线的自觉性

上海铁路局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王守道

我们是在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形势下来到市委党校学习的。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进一步端正思想路线，增强党性，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这是我们的主要目的。七个月来，我们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党的学说，学习中央一系列重要文件。整个学习过程，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

原理武装自己头脑的过程，是不断冲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思想禁区、进一步解放思想的过程，也是增强党性锻炼、不断改进作风的过程。通过学习，我看到了林彪、“四人帮”流毒在自己身上的反映，找出了思想僵化的原因，进一步端正了思想路线，提高了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自觉性。下面就谈谈自己的体会：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四人帮”就对这场运动进行疯狂的干扰和破坏。当时林彪、“四人帮”把他们干的一切都说成是毛主席的指示，而且宣扬什么毛泽东思想是“顶峰”，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等等。而且对这一套有不同看法的干部群众扣上“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帽子。在运动中，我作为“走资派”被批斗，受到很大冲击。虽然有不少问题想不通，如，我们的党是不是整个的都不行了？为什么各级党组织都要停止活动？干了几十年革命的老干部，他们为什么都成了走资派？但当时在这种情况下自己对这些问题又不敢多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思想就处在这样的矛盾之中，常常还反过来责怪自己思想落后，右倾、保守，不能理解新事物，没有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

一九七〇年中央庐山会议以后，在参加批陈（以后是批林）整风的过程中，我对一些问题的怀疑多起来了，但怕弄不好又要犯错误，因此，我暗暗给自己设了三道“防线”——决不能说毛主席有什么错误，决不能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什么缺点，决不能说形势有什么不好。实际上是自己给自己设下禁区。一九七三年铁路局召开党代表大会，我参加了会议文件的起草工作。“四人帮”在上海

的余党诬蔑这个会是“三不提”——不提夺走资派的权、不提一月革命风暴、不提第一列红色造反列车——的会，诬蔑这个会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走资派翻案，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会。我们受到了很大压力。特别是到了一九七六年，批判所谓“右倾翻案风”时，我也成了被批的对象，从这以后我的思想更是僵化了，办事情想问题，再也不敢越雷池半步。我每做一件事，都要找一条语录作根据，语录上没有的，就是看来必需做的工作，也不敢去做。我变得更加谨慎小心了。

七六年十月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我心情无比高兴，精神为之振奋。在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第一、第二个战役中，我是努力工作的，但是进入第三战役以后，思想上有些跟不上形势了。表现在抓大批判上，觉得有些界线不好划，有的同志联系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揭批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我就犹豫起来了，心想这样批好不好，会不会批到文化大革命的头上，会不会否定毛主席的伟大功绩，在行动上缩手缩脚，生怕重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去年五月《光明日报》发表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开始我没有注意，后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文章，特别是以后《解放军报》发表了篇幅很长、很有份量的文章，我开始注意起来。以后通过学习，逐步意识到这个问题不象是一个简单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政治问题。但是，要不要组织大家学习讨论呢？我又犹豫起来了。我们给好几个铁路局打了电话，打听他们有什么打算。当时我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原理本身是没有任何疑问的，问题是现在讨论这个问题，涉及到对毛主席的看法和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这两个问题正是我的思想被禁锢得最厉害的问题。

题。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很严肃，关系重大，是爆炸性的问题，中央没有文件，几个上级也都没有明朗的态度，我们稳一点为好，切不可贸然从事。以后陆续看到不少省市和大军区的负责同志就这个问题讲了话，中央和各省市报刊都发表了文章，单位里有的同志也批评我们为什么不组织学习讨论。经过反复考虑，到了八月份我们才下了决心，做了一点工作，但是心里仍不踏实。来到党校以后，开始，由于对这个基本理论问题缺乏正确的认识，所以对一些重要思想理论是非的讨论，思想很不解放。如怎样正确认识领袖和群众的关系？怎样看待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不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林彪、“四人帮”的路线的实质究竟是右还是左？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问题？等等。自己翻来复去思考这些问题，有时有些新的看法，但总是跳不出老框框。一个人思想僵化了，总习惯用老皇历看问题。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专题学习讨论，我的思想认识才有了真正的突破。后来，进一步学习了三中全会文件、邓副主席在全国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和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才对解放思想的问题有了更深的理解。

从以上我的思想演变过程中可以看出，解放思想说说容易，做起来却很困难。因为思想僵化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有它的思想根源和社会历史根源。我的思想比较僵化，主要是有以下三个因素造成的。

首先，是由于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现代迷信在头脑中作祟，不敢冲破“两个凡是”的框框。我热爱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坚信不移，这是对的。但这不等于就能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毛主席和毛主席的思想。加上“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流毒

没有很好肃清，所以我就不能把毛主席一生的巨大功绩同他的某些缺点错误区别开来，就不能把毛泽东思想同他的某些不正确的论断区别开来，就不能把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同他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结论区别开来。现在我认识到，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对毛主席一生的巨大功绩和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是任何时候都不能怀疑和动摇的。但是毛主席是人不是神，对他的个别论断是要随着事物的发展，实践的检验重新加以认识的。一些不正确的东西就不能加以肯定。只有善于掌握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才是对待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才是高举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如果从迷信出发，抱着“两个凡是”的框框不放，那就是用唯心主义的态度来对待领袖，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要失败的。

其次，是中了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毒，存在着宁左勿右的思想。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场运动一开始就受到了林彪、“四人帮”的严重干扰、破坏和利用，在一系列问题上都存在着严重问题。实事求是地分析这些问题，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纠正运动中间的一些冤、假、错案，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如果谁一谈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就说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右倾翻案，这更是错误的。但这个问题过去是不准人们碰的，我看到有许多人是在这个问题上挨了棍子，自己也尝过滋味，因此，自己从消极方面吸取了过去挨整的教训，认为在这类事上表现得左一点，多说几句好话总不会错，如果说出了问题，讲你思想右倾，这个罪名可受不了。所以，宁左勿右也是造成我思想僵化的一个原因，现在我认识到，“左”的错误和右的错误，极左路线和右倾路线，都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都是会给革命造成

重大损失的。在本质上不存在那个好那个不好的问题。人们思想上之所以会产生左比右好的错觉，正是人们不正确地记取过去经验教训的结果。不是从党和国家的利害关系方面来记取，而是从个人利害关系来记取的。这方面林彪、“四人帮”的流毒还很深，需要花更多的功夫。

第三，是受了小资产阶级习惯势力的影响，求稳怕乱，安于现状。十多年来我们吃够了林彪、“四人帮”“斗斗斗”的苦头，都想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对的。但安定团结必须建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建立在共同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安定团结要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我们必须看到，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对我国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的破坏实在是太严重了，不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端正我们的思想路线；不把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搞正确，实现安定团结是不可能的。因此，不要把安定团结看成是孤立的、静止的东西，必须不断创造条件，进行必要的斗争，把大是大非问题弄清楚，才能求得真正的团结。从小资产阶级的习惯势力出发，满足和安于现状，以这样的思想去求稳，就必然不会稳，以这样的思想去防乱，就必然会乱。这种习惯势力的影响，我们是一定要注意克服的。

最近，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有人把这股思潮的出现归罪于解放思想，我认为这是十分错误的。解放思想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完全一致的。解放思想的目的，就是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勇于冲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思想禁区，大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为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而斗争。思想解

放的要求，就是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按照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认识事物，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办事。只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从根本上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揭露他们的假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揭露他们“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坚持科学的社会主义；批判他们的封建法西斯的全面专政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批判他们反动的“踢开党委闹革命”的谬论，坚持党的领导。如果解放思想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离开了四项基本原则，那只能是胡说八道，不能叫解放思想。

在学习过程中我还认识到，学校安排教学计划时，都把学习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问题放在突出地位，自始至终贯彻解放思想的精神，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是符合我们的思想实际的。因为解放思想不仅对高级干部是重要的，而且对基层单位、一般党员干部也是重要的。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能把我们的思想统一在三中全会确定的方针、政策上；就不能做到大胆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已经一年多了，通过学习报刊上的文章，许多干部的思想有一定提高，但是实际上有不少单位对这个重大问题并没有认真开展讨论，不少干部仍然采取等待、观望的态度，思想还处于僵化半僵化状态，因此，这个问题的讨论还必须深入下去。在党校学习期间，我在思想解放上有一些进步，但也不能说这个问题我都解决了。今后我更要注意学习，继续清除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并落实在行动上。要和本单位和基层单位的同志一起，深入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继续解放思想。同时，解放思想和增强党性是分不开的，有私心杂念的人是不能坚持真理的，我还要注意加

强党性锻炼，努力改造世界观，为党多做工作，在建设四个现代化的伟大斗争中，争取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肃清极左路线流毒 认真执行党的政策

南江县瓦屑公社党委书记 顾锦文

这次进党校学习了七个月，收获很大。在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的过程中，我结合自己十多年来的工作实践，着重总结了在贯彻党的政策方面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清除了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在我身上的流毒，提高了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方针和政策的自觉性，为适应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我是在“四清”运动后期加入党组织的。入党不久，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一伙为了篡党夺权，颠倒敌我，打着“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旗号，一方面荒谬地把什么都说成是阶级斗争，到处寻找阶级敌人；另一方面恶毒地攻击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大揪党内的资产阶级。他们喧嚷什么“阶级斗争抓好了，就是颗粒无收也不要紧”，“宁可两年不生产，也不能一时不搞阶级斗争，”等等一系列极左谬论，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搞得我们国家人心惶惶乱糟糟，政治上极大混乱，经济上濒于崩溃。在他们这种极左路线流毒的严重影响下，我也单凭热情，凭干劲，天天喊斗争、抓斗争。自一九六八年担任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和六九年担任党委副书记以来，亲自挂帅

管运动、伸拳头、喊口号、这也斗、那也批，从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群众，一有什么动向，马上就刮风下雨，搞运动、层层查。从刮红色台风到清理阶级队伍，从一打三反运动到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到揪所谓党内的资产阶级，我都把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结果搞了扩大化。在清队中，我们公社搞了六百多个案件，光一次大会就上台交待、点名了好几百人；在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中，对党员群众任意审查，有的变相抄家；在批判资本主义活动中，乱点名、乱批判，擅自没收社员的劳动工具。总之，在一系列运动中有的不应该点名的点了名，不应该批判的挨了批，不应该处理的处理了，有的处理重了，甚至随便关押人。思想上偏激，政策上过左。对地、富分子更是任意批斗，甚至游街体罚，致使有的受不了而自杀。虽然有许多事情发生在下面，但自己也应负一定的责任。十多年来，由于自己思想上偏激，没有认真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挫伤了一部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党的政策的威力，减弱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给公社的革命和生产造成不应有的损失。至今回想起来，心里很沉痛。我为什么会对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这样顺从呢？通过学习，我从思想上找了三个原因：

1、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认为左比右好。自己是个新干部，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但在思想上对党的方针、政策并没有很好学习和理解，缺乏党性锻炼和执行党的政策的自觉性。旧中国的农村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虽然走集体化道路已经二十多年，但小资产阶级思想并不那么容易清除，自己也没有摆脱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摇摆性的羁绊。特别是林彪、“四人帮”在台上以极左面貌出现，他们的“左”的一套对我有影响。因此，对待和处理问题，总认为“左”总比右好，“左”是革命的，即使错一点也是工作方法

问题；而右则是立场问题、路线问题、比较危险。因而在工作中就会出现一系列偏激的做法。如在清队中，头脑发热，认为到处都有问题，满脑子敌情。一九六八年，有一次公社召开五、六百人的大会，自己主持会议，把全公社有这样那样大、小问题的人都集中在会堂，采取高压手段，迫使他们一个一个上台交待问题，进行登记，搞得空气十分紧张。使一些有一般问题或犯了一般错误的人也不得不上台交待问题，搞得人人自危，扩大了打击面。而自己却还很得意，认为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斗争坚决，这样干有劲。现在认识到，这样做违反了党的政策，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有不少同志在会后思想紧张、情绪低落、工作无劲。

2. 办事光凭朴素阶级感情，缺少实事求是的科学思想。自己出生在劳动人民家庭，祖祖辈辈受地主、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对过去的血泪史记忆犹新，激起我对阶级敌人无比仇恨，对坏人坏事无比憎恶，内心对共产党、对毛主席、对社会主义热爱，对贫下中农怀有感情。因而对那些剥削阶级分子和他们的子女一发现有些问题，不管情节轻重、性质如何，都是毫不客气地进行批判、斗争，认为对这些人决不能有半点手软。每次大忙之前，总要找几个典型开批判大会，活老虎找不到，就找几只死老虎来斗一下批一下，认为这些家伙是死对头、死顽固，改造不好的，到棺材里去也要放臭气。而没有用实事求是的辩证的观点对他们进行具体分析，没有认识到矛盾是会转化的。地、富分子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可以进行改造、重做新人。即使有些地、富分子有违法行为，也必须实事求是地对他们批判教育。事实上，解放三十年来，有好多地、富分子，他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愿意接受改造，并且在改造中确实没有干坏事。我们对这些人，必须用历史的、辩证的眼光来看，坚决

按党的政策办事。多年来，我对地、富子女，也同他们的老子一样看待，每次运动，眼睛总盯牢这些人。记得有一次，发现一个大队的一个地富分子子女把他父亲临死之前写的一张条子藏起来，放在大箱子里的小箱子里，就感到有阴谋，不问青红皂白立即把他隔离审查，关押起来，问为什么要藏条子，一定有问题，联系队里发生的一件偷窃案，搞了好几天，还开了社员大会批判他。当时认为是变天帐，他们是人死心不死，鱼死眼不闭，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后来查来查去查不出什么问题，只得把他放了，倒弄得自己很被动。实际上，三十年来，除了少数个别的子女坚持他们反动老子的立场、仇视社会主义的以外，绝大多数是拥护共产党、愿意与他们老子的反动思想划清界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何况他们本人并不是剥削阶级分子，怎么可以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对待他们呢？因此，单凭感情办事，没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也是不能正确执行党的政策的。

3. 思想上骄傲自满，看问题主观武断。自己有自来红思想，而且工作一帆风顺，因此，思想上产生骄傲自满情绪，总想做点成绩，搞出点名堂。在工作中往往用主观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问题，缺乏调查研究，凭想当然办事，处理人的问题常常主观武断，或是简单肯定，或是轻易否定，这样做也吃了不少苦头。记得在清队中，有一个四类分子为了及早解脱审查，交代了一个“东南亚反共忠义救国军”的现行特务组织，当时只听信口供，不作调查研究，就根据他交待的线索，一下子把瓦屑、横沥、周浦、下沙等好几个公社有关的人都隔离起来，甚至对被牵连到的外县的几十个人，也分别在各地搞审讯。一连搞了好几个月，弄得精疲力竭，后来才发现这个四类分子的口供是假的。又如在一打三反运动中，

有一个大队下伸店失窃现金 500 多元，当时，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凡是进过小店的人员，全部集中起来办学习班。上有大队长、生产队长，下有一般群众，连自己老婆也进了学习班（因为也进去讨过茶吃），在办案过程中，我还根据抽象的逻辑推理，判定是一个生产队长偷的，几次找他谈话。但事后破案，却是其中一个出身好、平时装得很老实的店员偷的。这件事使我深感痛心，对我的主观武断、个人唯心主义也是一次惩罚。我虽作了公开检查，对有关人员赔礼道歉，但当时并未从思想路线上查根源，现在认识到，搞主观唯心主义，必然要伤害同志，危害革命事业。凭热情、想当然、迷信自己，不注重客观实际，不搞调查研究，就会偏离和违反党的政策，这样做是没有不跌跤的。

在学习过程中，我认识到，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党的历史证明，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是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我们搞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靠少数人总是不行的，要靠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人民的努力。革命和建设，总是人越多越好。作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要取得革命胜利，只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这就一定要靠我们党根据马列主义原则，根据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况，制定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从历史上看，凡是执行了正确的方针政策，革命就成功。抗日战争时期，我们以中华民族利益为重，提出国共合作，深得人心，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得到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的拥护，革命形势越来越好，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建国以后，我们党正确制定和执行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顺利地进行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反之，如果在政策上或左

或右，那就会对革命造成损失和挫折。在历史上，我们党吃左倾路线的亏是不少的。王明路线几乎葬送了我们党，使红军损失了大部分，只剩下二万多人，白区损失百分之九十以上，全国只剩下二万党员。林彪、“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疯狂推行极左路线，使我们党遭到了灾难性的洗劫，把国家推向了崩溃的边缘，比起王明路线来，有过之而不及。他们造成的损失我们都是看见的。回顾党的历史，自己愈加感到正确执行党的政策的重要性。

在党校期间，我认真地学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深深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按照党的一贯政策，实事求是地解决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和文化大革命以前遗留下来的一些重大历史问题，分清了一些人的功过是非，纠正了一大批冤案、假案、错案，这充分体现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精神，确实是恢复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调动了全国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对于促进安定团结，动员全国人民同心同德搞四化，有很大意义，这类例子不胜枚举。我们公社有一个社员，当时因为有放火犯嫌疑而被公安局关押，经过复查后，证据不足，加以平反。这个人的亲属有九十多人，有不少还是党员干部，过去，这些人都背了亲属是放火犯的包袱，思想负担很重，平反后，不但这个社员，而且他的亲属的精神面貌也大有变化，调动了这一批人的积极性。真是落实政策可以调动千千万。虽然在落实各项政策的过程中，我们的工作有不够稳妥的地方，但决不能把具体做法上的缺点，看成是政策上有偏差。那种认为三中全会以来落实政策是“右”了、“偏”了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决不能再让林彪、“四人帮”这一套极左货色来害人。

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切实平反和纠正

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所造成的冤案、假案、错案的精神以及中央关于改变长期劳动守法的地富分子成份的决定，全国都要贯彻，我们公社也不例外。过去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思潮，严重破坏党的政策，自己也受了影响，凡是自己所搞的冤、假、错案，现在也应该迅速纠正过来，执行政策上极左思想的影响，应该坚决克服。通过学习和总结，我深深感到，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战士，应该目光远大，胸襟宽阔，以革命大局为重，想全党之所想，急人民所之急，团结一致向前看，认真落实好党的政策，做好善后工作，决不能抱个人恩怨，涉及到自己的，要主动承担责任。

今后，全党的工作重点就放在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上，阶级斗争必须围绕四个现代化进行。对阶级斗争，既不能搞扩大化，防止偏激情绪；又不能放松对存在着的少数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以及没有改造好的四类分子的斗争，思想上不能右。要坚决按照党的一贯方针政策，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利于四个现代化建设。党对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和其它政策，也要正确执行，决不能各取所需、随心所欲。要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以党的政策作为推动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强大动力，不断夺取四个现代化的新胜利。